

邊界與越界：《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的文化政治

Boundaries and Boundary-Crossing: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Compendium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1919-1949*

鄭文惠 (Cheng Wen-huei) *

一、文學遺跡與指認自我：《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的文化層位考古學

歷史因人因事因物在流動的時間軸線上與開敞的空間向度中彼此織構而相互流轉出殊異而共感的身世，方能朗映出立體分明而可感可知的歷史，正因有情的歷史使記憶重生與文化再造有了可能性。但歷史本然又是一個內含眾多權力、不同欲望的故事傳奇體，內在充滿著不同意識形態的交鋒對陣與動態組合，看不見的多重作用力讓它無盡的生長出不同的變貌，如天邊雲錦不斷的虛實交織、牽連、裂變、消佚、重生，變幻莫測，捉摸不定。

香港，在地理空間上一直是一個文化接壤之地，在歷史軸線上始終佔據了一個邊緣位置，不易被編派也不易被消蝕更不易被化約。近代以來，因著殖民與現代化及南來離散等政治文化經驗，香港作為一個聚合了天地之間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移民社會，多重殊異的身分不斷越界、流動，已然深深烙印出具獨特變貌的歷史年輪。

生於斯長於斯，人因著風土的潤養而生長出不同的面目，展演著各自的姿采，斯土斯城也因人而共構成有情的歷史。因著流動不居的時間長河，有情的歷史在地方性空間中沉積了一些可指認的相似又具差異性的遺存之物，這是一種在時間的巨大作用力之下，一層層堆積

形成了自然的與人文的「文化層」，所遺存的相似又有差異卻可指認的遺物與遺跡在不同的文化層序結構上，實質述說了在時間演進上隸屬於具地方性特徵的「文化層」的故事。因之，在文化層位考古學上，香港因著文化接壤與邊界空間的地理特質，本然是一個不斷變動的移民社會，如同海浪潮水般以萬馬奔騰之勢一波波擁向岸邊，但在折回又復返的過程中，卻又是無限的涵括、崩裂、更新；也如同油畫家以油彩融合再融合，層積再層積的表現出濃稠綿密的畫面，但隨著時間的作用力，油彩也已然不斷的分裂再分裂，企圖逃脫於繪畫母體；移民社會本然是融合再融合、分裂再分裂的無限的來回擺盪、運動，一切異質的和不均等的元素融合、分裂的過程，也延伸了、偏離了、變形了原來的母體，折疊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多重殊異的身分。這在朝向未來和面向過去的無止境的時空皺褶裡，移民社會始終只能是不斷越界的、裂變的符號體；殖民經驗與現代化歷程及傳統文化母體的牽引、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等，又使香港在佈滿多元異質的、不對等的元素所構組的皺褶層與分歧線上，多層向的擠壓出多重而殊異的時空皺褶，呈顯出在獨特的時代中香港獨特的歷史。在文化層位中所遺存的相似又有差異卻可指認的遺物與遺跡中，文學又是人生命存有詩意栖居之地，因此，《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編纂的文化工程，或許可視作是一樁具地方性特徵的考掘文學遺存物的「文化層」的考古學，述說著香港如何指認自我的故事。

*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二、邊界與通道：香港文化空間意義上的毗鄰與畸形

香港因著位處邊界的地理特質，而益顯其毗鄰的特質與作用，正因邊界與毗鄰，往往是文化接觸的重要空間，不同文化接壤、匯聚而形成多異變多姿采的樣貌，如同符號學上毗鄰軸（syntagms）作為一個組合體，是從系譜軸（paradigms）選出元素，又跟系譜軸其他元素組合而成，但又不失為其足以獨立而完整地指涉特定意義的符徵。毗鄰軸由原系譜軸分化而出，雖原生於系譜軸，但憑藉著詞序組合的凝聚作用與依存關係，一者因毗鄰的外顯關係（the external relation）將同一語境／上下文（context）的成分以序列合作（alignment）集結在一起；二者，語序組合中的語辭（term）在與前後相連的單位比較之中獲致了價值與定位；三者，在通過與其他符號組合而存在的同時，一個語言單位既容納其從屬成份，也包容在一個更大單位之中而與其共構成更壯大的符號系統，¹ 這是毗鄰不為主體卻又可自成主體的獨特性。或許香港可以邊界空間的毗鄰關係來組織其指涉範疇，正因香港地處邊界空間，而開啟複雜而多元的毗鄰關係，一方面作為文化接觸的重要空間，依據著某些慣例或原則，與多元多重的文化接壤空間交換著符號，組合著符號，以構成一系列有意義的整體而不斷製碼著；再者，毗鄰因「接觸性」（contiguous）而相互交通，也因毗鄰的外顯關係，類同性的序列因類聚而集結而構連，一者使鄰近性實體形成互動的網絡關係，並得以獲致相互之間的功能價值與定位；一者也因通過與鄰近性實體

的接觸、交通及彼此的依存關係而存在著也變動著。由於香港邊界空間的毗鄰屬性，因而在外顯的連結關係與交互作用之下，一方面內在的移民社會不斷的組合著、變動著；一方面也因外顯變項，而與鄰近性實體的依存關係與交流互動隨而擺盪隨而變異。

近代以來，香港為「華洋交涉之衝」，² 如徐勤（1873-1945）云：「明季之世葡荷諸國擅航海之術，開東方之道，立互市之場，定通商之約，而富甲歐土矣。英國繼之，遍外地，據印度，取南洋，割香港，通長江，握水道之險要，奪諸國之利權，商務之盛為諸國冠。」³ 隨著航海技術的發達，在地理大發現的時期，同時也開啟了帝國掠奪諸國利權而爭雄逞霸於世界各角落，香港成了帝國霸權俎上之肉。1825-1826年，魏源（1794-1857）和賀長齡（1785-1848）所編《皇朝經世文編》收錄維新派人士及《知新報》主要撰稿人之一的劉楨麟〈地運趨於亞東論〉亦云：「英之雄攬海權也，先據印度以為通商之基礎；繼據息力以為來往之咽喉；終割香港以為東南之總匯，盡略取太平洋南洋諸島之地以為外府，經營海上，曾靡餘力。舉凡宇內之腴肥巨區，衝隆要道，無不辟其鑰，排其戶，搜其奧，席其蘊，以伸其控轄闔辟壟網之權。」⁴ 英帝國由據印度而佔息力而割香港，從底定通商基礎到總括東南之總匯，是其雄攬海權步步為營的稱霸策略，而香港則是帝國眼中最終統攝東南洋的重要根據地。1891年使英大臣薛福成（1838-1894）即認為：「查香港一島為中外咽喉，交涉淵藪」，乃「擬於香港設一領事，其新嘉坡原設領事改為總領事，兼轄檳榔嶼、麻六甲及附近英屬諸小國

1 此處僅擬借符號學二軸理論，嘗試說明香港邊界空間中的毗鄰關係。有關符號學二軸理論由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以降不斷發展而各有不同論說，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的詩學理論作了較大的改變和擴充。相關論述可參見：索緒爾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古添洪，《記號詩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羅曼·雅柯布森著，錢軍譯，《雅克布森文集》（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第2版）、鄭樹森，〈選擇／組合：類同性／連接性——雅克慎和語言的兩軸〉，《幼獅月刊》48:1（1978.7）等。

2 唐才常，《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1〈通種說〉，頁101，1897年。

3 徐勤，〈論俄國不能混一亞東〉，《皇朝經世文統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影印光緒辛丑年上海寶善齋石印本），卷16〈地輿部一·地球事勢通論〉，頁538，1901年。

4 劉楨麟，〈地運趨於亞東論〉，《皇朝經世文統編》，卷16〈地輿部一·地球事勢通論〉，頁494，1901年。

小島，若慮鞭長莫及，或就地選派殷商充副領事，以資聯絡。」⁵英帝國以香港作為統攝東南洋的重要根據地，為了雄攬海權，乃在香港多方佈署與建設。早在1862年10月王韜(1828-1897)流亡香港，三年後寫〈香港略論〉即謂：「英人既割此島，倚為外府」，「設官之繁密」、「兵防之周詳」、「賦稅之繁旺」、「教民之勤懇」、「游歷之地咸備」，令之大為嘆服而直謂：「前之所謂棄土者，今成雄鎮，洵乎在人為之哉！」王韜對「香港一隅，僻懸海外」，本為「棄土」，短短二三十年間卻已然成為一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備具規模的「雄鎮」，不無慨嘆，尤其「香港不設關市」，「行賈者樂出其境，於是各口通商之地，亦於香港首屈一指。」⁶這在他文章中一再表述，如〈征設香海藏書樓序〉云：「香港地近彈丸，孤懸海外，昔為棄土，今成雄鎮。貨琛自遠畢集，率皆利市三倍，一時操奇贏術者趨之如鶩，西人遂視之為外府。」〈創建東華醫院序〉云：「香港蕞爾彈丸，孤懸海外，向者為盜賊之萑苻，飛走之原圃。闢榛莽，平犖確，建屋廬，不過三十餘年間耳。梯航畢集，琛貨遠來，今且視之為重鎮。」⁷在王韜南來離散的視域下，香港在短短的時間內由中國的「棄土」、「棄地」⁸轉為英帝國的「重鎮」、「外府」。迨至甲午戰

後，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1898)亦云：「英以香港為外府，自通商以來締造經營不遺餘力，迄今繁華富庶，遂為各島之冠。」⁹大抵而言，鴉片戰爭之後及甲午戰爭前後，知識分子有感於帝國霸權文化擴張主義的入侵，多能領略香港既為「沿海要口」，¹⁰也是重要的「轉運」口——「其出口至中國者皆由各國進口之貨物也」，¹¹更是「南洋通道」，¹²又「當東海之衝」。¹³如李鴻章(1823-1901)云：「然如香港一區，當英人未踞之先，不過蛋戶數家結茅其上；今則逐漸經營，屹乘重鎮，已據南洋咽喉，況該島當東海之衝，與中國之威海芝罘、日本之對馬島、朝鮮之釜山，均相距甚近，英人雖以防俄為詞，焉知其用意非別有所注。」¹⁴英帝「雄據香港」作為「南洋通道」，除經略南洋，謀取經濟利益外，主要仍在於作為侵略中國的始點，如燕樹棠(1891-1984)謂：「鴉片戰爭是英國積極侵略中國的始點，英國奪取香港、緬甸、新嘉坡等地，他的帝國主義在中國才有了根據地。」¹⁵誠如王佐才1888年在〈格致書院戊子課藝·問如何收回利權〉所云：「英人始入中國，本欲以舟山為請，厥後捨舟山而就香港者，亦以自歐洲而達東南洋，香港為適中之地，形勢最稱利便耳。而猶恐他國有垂涎者，故外則佯托保護為名，實以陰絕

- 5 薛福成，〈使英薛福成奏瀕海要區添設領事揀員調充摺〉，《清季外交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卷84，頁371-372，1891年。
- 6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卷6〈香港略論〉。另可參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ctext.org/wiki.pl?if=gb&res=646771>，檢索日期：2017/3/18。
- 7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8〈征設香海藏書樓序〉、〈創建東華醫院序〉。另可參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27340>，檢索日期：2017/3/18。
- 8 王韜，「香港蕞爾一島耳，固中國海濱之棄地也。」見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8〈送政務司丹拿返國序〉。另可參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27340>，檢索日期：2017/3/18。
- 9 淞南香隱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臺北：國風出版社，1965年影印本，光緒二十四年上海書局石印本），卷49〈兵政五·邊防上〉，頁738，1898年。
- 10 金匱闕鑄補齋編輯，《皇朝新政文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光緒二十八年中西印書會刊本），卷13〈形勢·論東南洋各島形勢〉，頁40，1902年。
- 11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47〈外交部二·通商〉，【英人】特甫【附】：〈中國通商各口二十一年分商務情形〉，頁1871，1901年。
- 12 金匱闕鑄補齋編輯，《皇朝新政文編》，卷25〈教會·論會匪宜設法解散〉，頁683，1902年。
- 13 李鴻章，〈李鴻章致朝鮮國王書〉，《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卷8，頁158，1885年。
- 14 同上註。
- 15 燕樹棠，〈英國侵略中國的概況〉，《現代評論》2: 30（1925.7.4）：4-5。

其望，英人心計亦狡矣哉。」¹⁶ 蔣觀雲（1866-1929）亦云：香港島與舟山島，「中國以為一外海無足重輕之島而已」，但「自英人得之，鎮以兵力，扼揚子江之下流，而有以當東南洋之衝焉。」「中國人視之，一不著於地圖之島而已，而他人以為不凍之港」。¹⁷ 近代以來，若以中國為核心而觀，香港是同屬於「海國長城」¹⁸ 的一個「中國之屏藩」¹⁹ 的空間範圍，既是護守中國的重要門戶，也是中國對外折衝的重要空間；若從帝國霸權的視角而言，就如同吳廣霈（1855-1919）所云：「然南洋鎖鑰，片島攸關。我得之可以自固藩籬，彼得之即可以抗我喉嚨。」²⁰ 香港既是帝國霸權抗中國、據南洋的咽喉，同時又當東海之衝，不啻標誌著香港是帝國霸權爭雄之權力部署，謀取利益的重要政治／地理空間。近代以降隨著帝國霸權在地理大發現的新視閥下交互競逐以拓植地理與政治經濟版圖，香港作為南洋通道，又當東海之衝，是全球化跨國經濟與帝國權力角逐的重要交匯點與必然的折衝處，勢必在世界多層權力競逐與多重力量交互作用下，形成一個獨特的地理空間範型與文化區域概念。

或許藉由近代知識分子的話語，香港是一個「通道」，標示出香港作為「邊界空間」或「邊緣領域」，是一個「中介空間」、「過渡空間」，既與其周圍的空間產生綰連與交流，又將許多原本不在視點或路線經過而不被重視的空間重新納入，從而進入新的空間知覺系統與權力體系之中。近代以來，無論是作為「南洋通道」或「東南洋之衝」或「華洋交涉之衝」或英帝的「外府」，香港儼如一個「通道」，²¹ 在人與人、國與國、空間與

空間的連結中，透過「通道」的多重空間串聯形式與人的空間行為彼此周旋往來，這個通道空間實質涵具了連續性、延展性、聯結性、包絡性、過渡性、開放性的多元性質與作用功能，而提供了一個人與空間互動、共構的空間舞台。

香港作為多重通道的中介空間或過渡空間，意指不同屬性的空間在相互交流、相互協商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突破非此即彼的封閉空間型態，而呈現為既內又外，亦此亦彼，兩兼其外的共存與對顯的關係。這種兩元化秩序之間與之外的多重性的混雜，由於凝縮了異質多元而迸發的轉化潛能，實質涵具了一種建構性的生成力量與爆發性的革命潛能，而呈顯為一種開放的、流動的、解放的、抵抗的空間樣態。亦即中介空間是緩衝二元對立、超越二元對立的一個不定型的協商的空間場域，隨時生三而成異（thirding - as - othering），²² 既複雜矛盾又曖昧難明、不易定位；既相互糾結又彼此衍生、裂生縫隙；既折衷調和又不失各自特質，這是一個中介空間所呈顯的混雜或闕限狀態，是不同意識轉換或精神轉化的疆界空間，各種意識形態展演在其間，而形成獨特且極具衝擊性的日常場景，這或許是香港文化空間的基本模態與變動的演化態勢。

因而，或許香港作為與大陸、海洋及其他島嶼連結的文化接壤之地，展演了越界與出走的跨文化流動的典型性樣態，而高度濃縮了全球化框架下人類存在的總體隱喻，尤其是在現代化歷程中身處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國族主義的歷史夾縫中，更展演了身世流轉的多元樣貌。香港作為空間與主體動態互構的場域，由

16 王佐才，〈格致書院戊子課藝·問如何收回利權〉，王韜編，《格致書院課藝》戊子年（光緒十四年，1888），頁2。

17 （蔣）觀雲，〈中國興亡一問題論〉（續第廿七號），《新民叢報》第廿八號，頁17-18，1903年3月27日。

18 吳曾英，〈南洋各島論〉，《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帙，頁8521，1894年。

19 王韜，「東南洋各島國，向皆我中國之屏藩也。」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5〈亞洲半屬歐人〉。另，可參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276795>，檢索日期：2017/3/18。

20 吳廣霈，〈南行日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續編》第十帙，頁63，1881年。

21 即使如現在香港內在都市空間裡，仍以世界密度之冠的多重通道連結著各個空間，人與空間透過多重通道迎來送往，不同的話語、相異的行動及多元的意識形態在其中快速的交織、流動、抗衡、協商著。

22 Edward W. Soja,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Oxford: Blackwell, 1996)。中文譯本，參見索雅（Edward W. Soja）著，王志弘、張華蓀、王珮民譯，《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其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臺北：桂冠出版社，2004）。

「棄地」²³而「殖民」的孤兒感或「畸形」²⁴擬態，或許是現代化國族政治規馴人的一種標本化的空洞能指，或許是資本主義社會下對存有的一種嘲弄與借喻，人的存在感、身體感因著政治的操弄因著經濟的利益而傾斜了天平。香港作為一個邊界空間，在文化空間意義上，或許可指涉於畸零、畸餘，是殘餘碎片的異常的有機體；而身處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國族主義的歷史夾縫中，香港畸形的形象修辭，不免又是一種帝國霸權與資本主義權力合力宰制關係下無主體的想像性關係位置的換喻修辭，在喪失話語權與支配權的意識形態符碼下的一種無力感或自我的戲謔。然而，反身自指的想像性的角色置換，往往也是抗逆現實日常結構的一種姿態或宣示，而涵具了反結構的文化象徵意涵。亦即處在邊界的中介空間或歷史夾縫中，往往最能覺察到自我的狀態，香港邊界的空間結構和重層的歷史縫隙，適足以真切的顯露出自我或社會的闕限狀態。游走於中介空間的微妙之處，正在於多重不同空間與人交會、重疊、碰撞、對峙、消長，而致生錯綜複雜、昏味難明的感受和經歷。亦即自我與社會處在闕限空間的經歷與感受過程中，透過人與時空重組和測繪重構的闕限過程中，實質並置了複雜矛盾而無法預期的行為與思想和文化的糾結、置換及轉變，也呈現出相當激揚的感官強度，並呈顯為一種革命動能而不斷的建構生成，進而鬆動原有而形成新的可能性，這是一種持續變動的心理情感，這種持續變動的心理情感也隨時崩解或重構了現實。因而，無論是殘餘碎片或畸形擬態，均指向於香港作為異常的有機體的存有感。然而，正因殘餘慵倦，不合常規而得能非凡超俗，一如莊子筆下的畸人，因「自反」而「懸解」。²⁵香港既作為文化接壤之地，在流動而開放的時

空重組經驗中，不歇止的受容各種可能，因而就如同花瓣落入萬花筒中，能折射出璀璨奪目的迥異姿采；香港既在邊緣位置，則可以非主流非中心，既在此又在彼，游走於二元秩序之間與之外而展現創變力。《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所選正是香港實質佔據了一個重要位置的年代，有了香港文學，方能更多元折射出近代中國傳統／現代文學的總體發展，也才能酌定香港作為邊界空間與文化接壤之地的空間意義，及在全球化流動下作為一個政治、經濟折衝、斡旋的「通道」空間的作用與功能，及在其間人與空間有情的動態共構的文學空間意義。

三、他性與認同：香港文學的認知測繪

西方哲學本體論強調他者是由自我意識所投射出的一種意向性存在，或緣於自身內在的他者性，或存在著他者所賦予自我的他者性；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5-1995）則翻轉本體論漠視「他者」的他性傳統，強調他者的絕對性，而開啟了與他者關係的倫理學。²⁶無論是自我內在的他性或他者對自我他者化的他性，他者的存在與朗現，在實質意義上是構築自我意識與自我存有感及完善自我道德的必要基礎與必然條件，也是確證自我意識與存在感、完善自我道德的主要中介。正因意識到想像中的他者的存在，或有感於他者對自我他者化的凝視，自我才開始凝視自我或完善自我。因之，擁有他者感是一個必要的中介過程，擁有他者感之後，在他性與自我之間與之外尋求一種自我與他者的存在感與倫理意向，則既意識到他者是自我的意向性存在，也在看與被看的觀看位置與觀視機制下確立自我

23 王韜，「香港蕞爾一島耳，固中國海濱之棄地也。」典型是以國族政治立場標顯出香港如同中國的棄嬰。見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8〈送政務司丹拿返國序〉。另，可參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27340>，檢索日期：2017/3/18。

24 陳國球，〈導言〉，見陳國球主編，《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評論卷一〉，頁53-54。

25 參見《莊子·內篇·大宗師》及《莊子·德充符》。有關畸形香港的論述，參見陳國球，〈文學評論與「畸形香港」的文化空間〉，《香港的抒情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頁177-178。

26 列維納斯絕對他者之說，參見Emmanuel Levinas, *Difficult Freedom: Essays on Judaism*. Trans. Sean Han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0).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P, 1969)。賴俊雄，〈眾裡尋「他」：列維納斯的倫理洞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5: 3（2014.6）：64等。

與他者的相互關係，並從中逼顯自我的主體意識及體驗到自我的存在及道德倫理向度。

當然香港作為一個文化他者，在漫長的殖民歷史中，交織著權力－知識－慾望的多重層的關係。香港作為一個他者，在歷史夾縫中實質呈現為交織著多樣意識形態與多重權力部署，因而理解歷史長河中被他者化的香港，及香港自我意識的生發與形塑過程，是必然且必須的文化工程。故而，從 1919-1949 遺存的香港文學中，透過不同文學文本的美學修辭與空間化操作，考掘香港文化與香港文學相對於中國傳統／現代文學，或在全球化流動與殖民文化體系中作為一個差異性能指的可能性，或許是一個可能與可行的方案。當然這還必須放置在中國／香港／臺灣及中國／東亞／全球的大歷史圖像與跨語際實踐 (translingual practice) 的脈絡下加以參照與比較。然而，最直接最切身的仍是殖民主體作為慾望機器的文化再製機制與多重權力部署之下，自我與他者如何在歷史吸納與抹除的時間張力及邊界空間的通道作用與接壤引力之下呈現彼此照顯的相互關係與相互定義，這是理解香港作為他者性存在及主體意識形塑的基礎。

《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總主編陳國球借用列維納斯的他異性 (alterity) 描述香港的不能被化解、絕對的意義，及「香港的華人就在企圖『認同』與體認『他異』 (otherness) 之間，不斷探求身份的定位。」²⁷ 列維納斯翻轉西方哲學本體論漠視「他者」的他性，訴諸於形而上的倫理概念，強調「他異性」本不應被同質化，個人主體性不容被侵蝕。列維納斯認為他者是自己生命倫理關係中的絕對他者，絕對他者以表徵著良善、正義、道德召喚等先驗良知的「臉龐」，不斷的喚起自我向善的道德意識，從而使自我反省、批判，並修正、彌補不善不義。自我永遠無法以暴力或化約等方式以捕捉、占有、支配及吞噬、抹滅、消泯此「臉龐」。絕對他者的「臉龐」的浮現，照顯了自我發現與承認和絕對他者存在著差異不對等的存有位置，進而以倫理的承擔具體回應絕對他者的凝視，如此方能建立與維繫永恆而美好的

人性關係，從而構築出共群間的優質的倫理關係。²⁸ 如果我們借用列維納斯他者的看法，從先驗的絕對他者落實為具體現實中的絕對他者，則作為一個絕對他者，香港多重殊異的身分與境遇本具不可化約性，無法被編派或被消蝕化，有其絕對而獨特的意義；而多樣性的香港文學空間中我思我感的流動意識或意向體驗，既是最本己的，同時也是表顯香港他異性的絕對意義的最佳展演空間。因此，香港作為一個他者存在，實質具絕對的差異性，全然的無法在合法化的宏大敘事的政治文化操弄中被消抹、置換或收編、同化。這種絕對的「他異性」，外在於自我，超越於自我，既無法是另一個自我的複製，也無能同化於自我之中。

因之，一者，香港作為一個文化他者，1919-1949 香港文學空間裡，如何因應著時代的詭譎，歷史的荒謬，存有的虛空，而以絕對的、異質的他性，抵抗著、協商著文化霸權和文化帝國主義，以回應西方神聖秩序解離後俗世化世界的現代性挑戰，在書寫實然的差異不對等的存有位置與社會現實及生命內蘊的同時，如何重構一種應然的生命的、社會的、世界的圖景，乃至於擘劃出俗世化世界應然的文化秩序？

二者，1919-1949 香港文學空間中所展演的絕對的他性，作為一種修辭策略與抒情意向的表徵，是一種抒情自我與現實世界的周旋，既是溝通、交流，也是抵抗、斡旋。然而，這種他性的絕對差異，因著《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而回魂，這文學空間中的絕對他者的「臉龐」是否也會召喚著現實中的自我而有著倫理向度的承擔？

三者，香港文學的書寫，乃至於《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的編纂，不言自明的即是主體開始敘述自我的故事，是一種重新凝視自我，尋求身分定位，追求主體認同的開始。文學家以一支筆凝視著香港凝視著自我，編纂者及接受者透過香港文學遺跡而凝視著香港凝視著自我，凝視本身獲得了一種客觀的存在與主觀的興發。藉由構成話語與行動的文學空間，不啻打開了一道

27 參見陳國球，〈文學評論與「畸形香港」的文化空間〉，《香港的抒情史》，頁159-163。

28 同註22。

道歷史縫隙，敞開了一個個欲望空間，透過抒情之筆看見自我與他者的匱缺與欲望，看見歷史夾縫中以文學抵抗以表徵存有的悲歡憂喜及創傷性的遭逢與困局。因之，是文學的抒陳賡續了有情的歷史，纂集匯編又是召喚抒情原音的重要文化工程，再度促成站在不同位置的觀看行為，以不同的觀視機制游走於不同的感覺閾限中而轉換意識、轉化精神，逐而認知測繪出香港不可取代與不可化約的他異性，而在他異性中有了進一步主體認同的感發與確認；乃至於透過文學空間中的他異性的「臉龐」，重啟對話，召喚責任，從而建構出共群間的優質的倫理關係。是以，或許《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的出版，既是一個測繪他性的差異倫理的起點，同時也是體認他異性的自我指認與主體認同的開始，更是共群思想解殖，開啟優質倫理關係的契機。

四、銘刻記憶與抗拒遺忘：《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的招魂術

「文學大系」作為在一定時代脈絡與文化視域下複合著理論、作品、史料等內容，以呈現文體類型與流變，及文學史建構意涵的文學編纂工程，自有其為文學存史、為文學述史、為文學傳史的意義及文化功能。

大體而言，中國／臺灣／香港「文學大系」的編纂，皆與時代轉向、政治局勢或歷史大事密切相關連。由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在 1935-1936 年出版，時值國共內戰與日本持續侵華的政治動盪，故而召喚「新文學」的「文學革命」精神，喚回救亡圖存的革命運動精神，從中不免也再度肯認新文學是作為舊文學與舊文化的對立面，並彰顯新文學的革命意義與反抗精神。²⁹而臺灣余光中 1972 年主持《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的編纂，正值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司徒

衛等在 1979 年至 1980 年編輯出版《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所取材以在臺灣發表的新文學作品為主，而時間則以 1949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為起點，到 1979 年中美斷交為限。至於香港文學的提問與編纂構念，大抵也源於 1984 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前後香港陷入昏昧未明的狀態之中。³⁰似乎「文學大系」作為一種文化生產，與政治局勢、主體意識、身分認同密切相關，述說了文學與現實、文學與政治、文學與記憶、文學與認同、文學與在地性之相因相生而蟬聯往復的周旋互動的關係。

相較於其他「文學大系」的編纂，《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總主編與各卷主編皆是由香港在地的專家學者組成，倘若如總主編陳國球所言，12 卷本的《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的編纂是一項「抗拒遺忘」³¹的工程，則《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作為銘刻記憶與抗拒遺忘的重要文化工程，如何召喚埋藏在時間底層的文學幽靈，以一種魅影再現的方式現身，而得能在不歇止的時間之流與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中召喚記憶，從而使接受主體在記憶之河中抗拒遺忘？埋藏在文化沈積層裡的文學幽靈以被用來召喚記憶之姿回魂，實質涉及招魂術的技術與靈驗。尤其有中國／臺灣等「文學大系」的原生與賡續及歧出，則在所謂正統與別傳³²之間或之外，《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又如何立足？既賡續又他異？終而島民得以因招魂而自我回魂，抗拒遺忘而自我認同，共構一個香港文學空間的集體想像，使多元主體之間因香港文學而接合而構連（articulation），從而有安身立命的依止，生活與精神有所依傍有所寄託？或者因抗拒遺忘，憑藉招魂術，使文學幽靈回魂，得能證成香港文學史之文脈、史脈與地脈之周流輪布，及其與中國傳統／現代文學及臺灣、南洋、東亞乃至於世界文學和人文思潮之共構與交絡關係？

此中環節，涉及：在原型、正統或別傳所建立「文

29 陳國球謂，「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其目標不在經驗沉澱後重新評估過去的新舊對衡之意義，而在於『運動』之奮鬥記憶的重喚，再次肯定其間的反抗精神。」見陳國球，〈香港？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總序》〉，同註 24，頁 25。

30 參見陳國球，〈香港？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總序》〉，同註 24，頁 20-21。

31 參見陳國球，〈自序〉，同註 27，頁 viii。

32 參見陳國球，〈香港？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總序》〉，同註 24，頁 4-17。

學大系」的結構模式之下，如何取納？如何殊異？如何在一定時代脈絡化轉向下照應文體通變，又關聯香港文學文化生態，以鋪陳香港文學的歷史發展脈絡及其傳統／現代、典律／異色、正統／別傳、華／洋等文學與思潮的頡頏與協商等涉及文風演變、文學範式、跨語際實踐等諸多面向。亦即面對中國及臺灣等地文學大系類型演化所創構出的方向、模式和習而為常的格套之下，作為晚出的或遲到的《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在 1984 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前後期許編纂的浪潮，到香港回歸中國幾近 20 年的 2016 年方能以 12 卷本綴文成套的回應與落實 30 年來的想盼，則香港的身世或走向仍處於昏昧未明的當下，如何在政治與文學之間思考文學的本質與大系的文學史意義，而不陷入高度政治意識形態的文化操弄，本然是一個感性命題與邏輯力度的拉鋸。尤其是香港文學在材料散佚，張羅不易的現實狀態下，如何蒐集揀擇如何抉剔蕪蔓如何擇優選萃？如何依違在「文學大系」的文類傳統與範式結構下，著眼於不同的地方脈絡與文化視域，因應著文體類型的自我演化而增補，並將文本選樣所涉及典律／非典律的折衝、斡旋，乃至於美學的裂變、解體，而促成美學範式移位等各體文學與理論思潮及史料複合共構成一個屬於他異性香港多元而異彩的文學空間，並在這多元的文學空間裡再現出一個隱在的文學史的大歷史圖像，這無疑是一樁艱鉅而複雜的文化工程。

《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全編共十二卷，「散文」、「小說」、「評論」各分「1919-1941」及「1942-1949」兩卷；「新詩」、「戲劇」、「舊體文學」、「通俗文學」、「兒童文學」、「文學史料」各一卷。在史料與評論的方法與視域下，各體文類選萃新／舊並陳，雅馴／通俗並置，全編環繞著現代性和主體性議題展演香港文學的光華與異彩，各體文類及評論

與書刊、人物、事件等史料³³所涉及的新／舊的並存與詰辯、傳統文學的現代變異及香港文學與文化如何參與現代性歷程的總體現代化經驗，乃至於文學文化的空間化實踐，如何介入社會—政治—經濟變遷的動態歷程中等，「各種論見的交錯、覆疊，以至留白，更能抉發文學與文學史之間的『呈現』(representability)與『拒呈現』(non-representability)的幽微意義。」³⁴從而一方面彌補了傳統／現代文學史的一個空缺與遺憾；一方面藉由各卷主編的史才、史觀與史識，以一種文學史的觀照，「讓香港文學的『過去』在文學史意識下顯現」。³⁵因而，或可說《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是勾勒香港文學史的大歷史圖像的重要起點。

再者，近代以來，香港文學的書寫與香港文學史的建構，如何在殖民地現實及資本主義社會運作邏輯與多元移民族群生態中，聯繫到文化母體或「中國」概念及在全球化人文思潮的流動與牽引下而有不同形塑的可能，這不僅涉及文學傳統的承繼與轉化，也關涉於在全球化跨文化流動下，自我與他者在異置與共在的跨語際實踐過程中，一種共性與殊性交錯互動下，香港以其獨特的邊界空間與通道作用，在毗鄰共生與流動交換的文化空間屬性與意義下，如何與他者共存互生及自我如何蛻變再生？這是一個既現實又嚴肅的課題，這不可能只是一種傳統／現代的複製或斷裂，乃至於與文化母體的承續或割裂可以簡單化約或平面描述。香港文學的再現，大體而言，是涉及一種邁向現代性歷程中承載傳統文化母體，又在華／洋跨語際實踐過程裡吸納、轉化而異變的總體走向，而《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適足以作為這總體走向與革命實驗成效的總體檢。

而「時間」作為「文學大系」傳統的一個永恆母題，³⁶《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實質上開展出一個自覺的空間母題及文學史意義的象徵性時間，而非如同原

33 《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文學史料卷》是以書刊、人物、事件三大項構成《文學史料卷》所形塑的歷史圖像。參見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文學史料卷·導言》（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頁73。

34 參見陳國球，〈香港？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總序》〉，同註24，頁30。

35 陳國球專訪，〈把文學的記憶帶回香港〉，《深圳商報·文化廣場》，2016年7月24日。網址：<http://xw.qq.com/stock/2016072401922/STO2016072400192200>，檢索日期：2017/2/28。

36 參見陳國球，〈香港？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總序》〉，同註24，頁17。

型《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想當然爾的一律收編的姿態，或如司徒衛等《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以國民政府遷臺為起點到 1979 年中美斷交在臺灣發表之新文學作品為限，其中大系命名與文本選萃的時間與空間考量，凸顯了以文學統攝或表徵為「臺灣」是「當代中國」的正統性的文化政治考量。《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反覆以文本創製者、作品內容、文本創製工序等不斷游移往返於「文學」的身分、創作到閱讀的「文學過程」、「香港文學」的「重劃邊界」或「越界」等諸多面向思辨，主要乃在將「香港文學」的義界「問題化」，而突出「香港文學」是與「香港」文化空間形成共構關係的文學。³⁷正因香港獨特的邊界空間與通道屬性，又在殖民地現實中作為英帝國實驗資本主義商業運作邏輯與雄霸東亞雄霸世界的示範，多元移民族群聚攏其內又遷徙四方，不同訊息輻輳其中又輻射於外，因而，不間斷的受容異質多元的內容與形式，無歇息的流轉與傳播文學與文化，接受與反應共時互生，快速流動而變動不居。因而，將「香港文學」的義界「問題化」是一個重要的策略，《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只是「香港文學」義界的一個討論起點，更何況任何義界本是浮動的，義域的範定隨時而俱變，也本不易或不該範定，其中涉及本質的討論，當然也相關於意識形態的操作與權力的部署。再者，誠如陳國球所言：「時間」與「記憶」、「現實」與「歷史」是否能相互作用，是「文學大系」的關鍵績效指標，³⁸但《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呈現的更是「時間」、「空間」與「記憶」、「認同」及「現實」、「個人」與「政治」、「地理」、「歷史」的相互作用。

至於《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所擬定「1919」和「1949」兩個時間指標，大抵是在香港作為一定區域空間下自覺的一種具文學史意義的象徵性時間，除新文學運動以及相關聯的「五四運動」，是香港現代文化變遷的一個重要源頭³⁹外，「五四」也標記著現代性追求的一種時間象徵，⁴⁰甚而香港在新文學運動也從未缺席過，因而，「1919」的時間標記，表徵了香港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承繼與轉化關係，而「1949」則又是另一波南來離散群落的時間表徵。

如果將時間再拉的更遠一些，香港開埠之初，已然開啟了以香港為軸心，以世界為視野，而以其經濟以其文化影響著中國乃至於國際。如麥都思（W. H. Medhurst, 1797-1856）1853 年 8 月 1 日創刊的《遐邇貫珍》（1853 年 8 月 -1856 年 5 月），是香港開埠後第一份以中文為主的報刊，也是中國第一份刊登新聞圖片、第一份鉛字印刷、第一份中英文對照目錄、第一份標上新聞題目、第一份刊登收費的商業廣告並闢有廣告專欄的中文報刊。從 1855 年 1 月第 1 號起，增設的「布告篇」欄目，專門登載各類商業廣告、香港航運以及進出口貨物的行情，由於每期印數 3,000 冊，發行於香港、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通商口岸，⁴¹無疑標明了香港的商業地位及樞紐位置。《遐邇貫珍》第三任主編為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理雅各 1839 年被英國基督新教派公理宗的倫敦傳道會派駐至馬六甲傳教，並主持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43 年英華書院遷往香港，理雅各隨之而來任香港英華書院首任校長，因引入西式教育，而在香港開啟近代西式學科教育的先

37 參見陳國球，〈香港？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總序》〉，同註24，頁18-25。

38 參見陳國球，〈香港？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總序》〉，同註24，頁18。

39 參見陳國球，〈香港？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總序》〉，同註24，頁22。

40 同註35。

41 《遐邇貫珍》內容以西方歷史、科學（涉及地理學、天文學、物理學、地質學、醫學等）、文學、政治、宗教各方面的知識為主，結合了西學新知、西方文明、民主制度、時事新聞等，而以淺顯文字及詳圖講解為載體，形成通俗而實用的大眾化新聞傳播特點。〈《遐邇貫珍》小記〉闡明辦刊宗旨：「人人得究事物之顛末，而知其是非，並得識世事之變遷，而增其聞見」，「為華夏格物致知之一助。」《遐邇貫珍》，2號，〈《遐邇貫珍》小記〉，1854年12月，頁6。有關《遐邇貫珍》，參見松浦章、內田慶市、沈國威，《遐邇貫珍の研究》（吹田市：關西大學出版部，200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0%E9%82%87%E8%B2%AB%E7%8F%8D>，檢索日期：2017/2/28。

聲，成就了香港英華書院是近代亞洲最早的新式學府，是近代化開展以來提供西洋知識以至世界新知的亞洲第一學府。⁴² 理雅各後因校務繁忙，無暇顧及《遐邇貫珍》而停刊。但也因理雅各在香港而開啟了與王韜長期的文化因緣。理雅各作為西方第一位且至今仍具代表性的系統翻譯、詮釋、研究中國古代經典的人，除了憑藉著一種深刻的文化理性自覺及個人內在思想精神動力外，⁴³ 主要乃著力於在這個文化接觸空間裡認識了當時流亡香港的王韜。⁴⁴ 王韜原受聘於上海墨海書館館長傳教士麥都思，協助翻譯《聖經》，後清廷以其為太平軍獻策，欲與洋人通好，被視為逆黨，遭曾國藩等查拿，麥都思之子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庇護，藏匿上海英國領事館四個月；後經麥都思引薦，流亡香港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1862年起理雅各獲王韜襄助翻譯中國經典《尚書》和《竹書紀年》，即使1867年理雅各暫時離開香港回返蘇格蘭家鄉，王韜隨後也前往蘇格蘭持續協助翻譯《詩經》、《易經》、《禮記》等。1870-1873年理雅各短暫返香港後回英國，1876-1897年理雅各擔任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理雅各相繼出版《十三經》、《道德經》、《莊子》等，至今諸書仍多是西方世界公認的標準譯本，此外也研究《離騷》、《楚辭》等。也由於理雅各翻譯諸多中國經典，及任職牛津大學二十二載，培育出不少漢學家，理雅各對中國經典的譯介及對漢學的研究等卓越貢獻，不僅使中國儒家及其他經典有效的傳

播到西方，進而對西方的哲學、倫理、文學等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也是至今西方漢學研究與西方讀者接受中國經典的主要奠基者，而王韜在香港在蘇格蘭協助理雅各翻譯，更是對溝通東西方文化扮演著重要而不可取代的媒合作用。這或許是17世紀歐洲漢學傳播之後，理雅各與王韜彼此借力，互為助力，而締造了西方漢學的另一波高潮，開啟了一個西方接受與研究漢學的新時代。第一代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及第三代繼承人金尼閣（Nicholas Trigault, 1577-1628）等將儒家主要經典翻譯成拉丁文，開啟了17世紀歐洲漢學的傳播，影響及於法國伏爾泰（Voltaire, 1650-1722）、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德國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與沃爾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及英國廷德爾（Matthew Tindal, 1657-1733）等。據亞諾H·羅伯森（Arnold H. Rowbotham）研究，儒學在17世紀歐洲的重要影響有三，其一逐漸促使對基督教基本教義派有更多的批評精神，其二對個人與國家政府之間的關係的覺醒，其三藉以反思學者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⁴⁵ 而理雅各與王韜跨語際的文化實踐，更有系統的譯介與詮釋中國經典，影響層面更具普遍性、廣泛性與代表性，且更及於知識結構的媒合與深化，從而也淡化了彼此的文化本位，這是意識轄域化的鬆綁、抽離，在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e）的過程裡，進而使意識畛域有互相滲透、貫穿、融通及擴散的可能，而這都緣於香港作為一個邊界空間或通道作

42 周佳榮，《潮流兩岸：近代香港的人和事》（香港：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6），頁173-174。另，有關英華書院課程與教學內容方式，及理雅各與倫敦傳道會之間因世俗教育內容過多而不符應宗教神學教育導致關係告終，參見黃文江，〈英華書院（1843-1873）與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意義〉，載《アジア史諸問題：深澤秀男教授退官紀念論文集》（盛岡：岩手大學人文社會學部アジア史研究室，2000）。

43 見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8〈送西儒理雅各回國序〉。另，可參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ctext.org/wiki.pl?if=gb&res=646771>，檢索日期：2017年3月18日。

44 有關王韜與理雅各，參見王韜，〈與英國理雅各學士〉，收入朱維錚主編，《弢園文新編》（北京：三聯書店，1998）、段懷清，〈對異邦文化的不同態度：理雅各與王韜〉，《二十一世紀》91（2005.10）：58-68、段懷清，〈理雅各與晚清中國社會〉，《漢學研究通訊》24：2（2005.5）：47、[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9%9F%AC_\(%E6%80%9D%E6%83%B3%E5%AE%B6\)](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9%9F%AC_(%E6%80%9D%E6%83%B3%E5%AE%B6))，檢索日期：2017/2/28。

45 參見亞諾H·羅伯森（Arnold H. Rowbotham）著，謝文珊譯，〈儒學對十七世紀歐洲的影響〉，及彭文本，〈導言〉，《東亞觀念史集刊》6（2014.6）：369-399。

用而開啟了跨文化交流與跨語際實踐的契機。

此外，其後也由於倫敦會屬下的香港英華書院停辦，憑藉著王韜與理雅各的文化翻譯情誼，王韜和香港倫敦傳道會印刷所經理及原《遐邇貫珍》編輯也協助理雅各翻譯《四書》的黃勝⁴⁶合資購買英華書院的印刷裝置，而成立中華印務總局，專門承印中西書籍。王韜除建立圖書出版事業外，並於1874年2月在香港創辦第一份華人資本、華人主理、華人操權的報紙——《循環日報》，進而開展媒體傳播事業，奠定了中國第一報人的歷史地位。王韜從1874年至1884年在《循環日報》鼓吹變法自強及評論政局，⁴⁷影響了後來的康有為與梁啟超的變法維新思潮與政治行動。王韜在《循環日報》計有近千篇政論，既牽動了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也開創了在新興媒體空間中文人論政的先河，奠定了第一位報刊政論家的歷史地位。《循環日報》當時不只流行於香港，也流行於中國、新加坡、越南、日本、英國、美國、澳洲等地。⁴⁸理雅各與王韜在香港相遇及彼此成就，不僅使理雅各奠定其一生由傳教士而教育家而漢學家的多重身分而成為西方漢學界的巨人，而王韜在香港及旅歐經驗，得能以恢宏的視野，站在時代的高度，總攬中西文明的歷史進程，而以其駁異而繁富的知識結構，影響著中國甚或東亞、南洋，更遠及泰西，也成就了其作為中國新聞報刊的第一人及變法自強政治理念的前導者，乃至於開啟歐陸之旅（1867-1870）的先驅，而其識見甚或受德川幕末、明治初期日本學界矚目，⁴⁹並影響日

本近代歷史的開展，而成為近代中國與東亞、南洋現代性前導的思想巨人。理雅各與王韜無疑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與東西文明融匯最具經典性與代表性的跨文化交流與跨語際實踐的典型，而這一切都發生於香港這個邊界空間，也只有在香港這個文化空間，方能締造兩人在文化思想上的偉業與高度。可見香港作為一個文化接觸空間，從開埠之初，已然佔據了一個獨特的文化媒合的樞紐位置，扮演著對中國對東亞對南洋乃至於對世界的文化創造與傳布的重要角色與地位。

香港實質在近代歷史上往往是匯聚與傳布、創造訊息的主要空間，也是主要歷史行動的參與者。如19世紀末中國面臨被帝國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當時中外多有以圖／文並置，乃至多語並陳的時事漫畫，及時而深刻的以形象化的圖像展演當時的局勢。1898年7月19日，謝纘泰繪製〈時局全圖〉（“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刊載於與楊衢雲為「開通民智」而於1892年在香港創辦的《輔仁文社社刊》⁵⁰上，謝纘泰1890年在香港從事反滿清政府的地下革命組織，後與孫中山的革命組織興中會結合，謝纘泰在香港將所理解中國與列強的關係，繪為〈時局全圖〉的政治諷刺畫，傳遞中國與列強間主動權與權力不對等的政治現狀。1940年，地理歷史學者朱士嘉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到一份可能在1899年或1900年於日本出版的〈時局圖〉，圖配置了以廣東話書寫的詳盡解說，謝纘泰曾以為這可能在日本印製的滑稽歪曲模仿他的漫畫彩色版本，結果造成他被香港殖

46 1858年，黃勝與伍廷芳租用《孖刺西報》的一套中文鉛字，共同創辦《中外新報》，並以《孖刺西報》的中文晚刊名義印行，成為香港第一份完全以中文編印的報紙。1872年4月，又與《德臣西報》副主編陳靄庭合作，將原附屬於《德臣西報》的《中外新聞七日報》獨立出來，成立香港第二份華文報紙——《華字日報》。參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5%8B%9D>，檢索日期：2017/2/28。

47 王韜在《循環日報》中鼓吹變法自強及評論政局的政論文章，多收錄於《弢園文錄外編》。大抵卷一確立政論總綱，揭示國家治理鴻圖與方向，隨而總攬國家治理要務及變法自強的方針，及隨順著時局變動的政治謀略與評論。有關王韜的政論，可參見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各卷。另，可參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4230>，檢索日期：2017/3/18。

48 1878年《循環日報》出版晚報，是中國最早的晚報，此外還出版《循環世界》副刊，精選《循環日報》出版《循環月刊》等。有關《循環日報》及王韜與近代中國及近代世界，參見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館，2000），<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A%E7%92%B0%E6%97%A5%E5%A0%B1>，檢索日期：2017/2/28。

49 徐興慶，〈王韜的日本經驗及其思想變遷〉，《東亞文化交流：空間·疆界·遷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161-189。

50 馮自由，〈三十九年前之東亞時局形勢圖〉，《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41。

民地司（Colonial Secretary）的質疑；而後該圖經除去原廣東話書寫的文字，至今累年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用以揭露帝國主義者瓜分中國的企圖與作為。無論是除去原廣東話書寫的文字，或載入教科書作為文化再製工程，均在教育的空間場域中高度強化了政治意識形態。而黃遵憲（1848-1905）因維新運動挫敗後回返廣東家鄉梅州，牆上也張掛著另一版本的〈時局圖〉，1900年寫了與〈時局圖〉有關的兩首詩——〈仰天〉、〈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1903年蔡元培在上海創辦的《俄事警聞》也刊載〈時局圖〉。⁵¹這些大都是以謝纘泰在香港所繪製的〈時局全圖〉為模仿對象而有不同的再造。短短幾年間以香港為訊息創造與散布中心，在各地與域外產製了、流傳著諸多模仿〈時局全圖〉之圖／文互文性的政治諷刺漫畫，由香港而輻射至上海、廣東、日本等，因應著不同局勢不同對象與地理空間，圖／文的配置方式與互文性意義累經改動，這是一種涉及隱喻概念的跨文化流動的曲折而複雜的過程。這個政治文化地形學隨著時間軸線與空間延異，蜿蜒曲折，峰迴路轉，這是一個以香港為中心向外擴散的概念隱喻的延伸與變異的總體縮影。當然，概念／觀念在跨語際實踐過程中，與他者共在、異置而重新指認自我的同時，往往是在一種心理防禦機制與影響焦慮的過程中，而不斷引起符號的移位，意義的滑動。這種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與自我言說，本然是一段製造話

語權力與價值競技的歷史，同時也是自我建構主體性的歷程。⁵²因此，香港作為近代中國或近代世界訊息創造、交匯與傳輸的必經空間或核心空間，自然在文學文化的創製與傳佈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地位，即如《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也由香港文學研究社先後兩次重印或出版，均足以說明香港的邊界空間與通道性質，既能擁納萬物又能輻向四方的空間性意義與作為文學史系譜的時間性意義。

無可諱言，記憶與遺忘仿如對蹠結構般的構築為人的生命史與社會史，它同時都是一種文化選擇，建構了人的思維框架與歷史視野。《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編纂 1919-1949 香港文學，是為了抗拒遺忘而重述香港文學記憶，則綴文纂冊彷彿成了一場招魂的儀式，作為招魂詞的紙上文字，是經由時空流轉埋藏在不同文化層位中的經驗性與情感性的歷史建構物，閃爍著動人的人文輝光，是抒情自我與地方歷史、文化記憶共生共存所織構而成的一種積累性的表意實踐，積澱著一個大時代變動下香港作為他異性的一個人與空間共構互生的動態的歷史脈絡。許多歷史現場的話語如果沒有《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的編纂，或許會永遠湮沒於故紙堆中；現在以一種創造性和構建性的招魂技術重新出土了，在勾勒出一個歷史奇異點的香港文學座標的同時，也開展出一個新的香港文學里程碑。召喚文學幽靈是為了抗拒遺忘，復現記憶，因而，無論是哀悼或復原或揚棄或重

51 蔡元培於1903年將「五彩鮮明，上海別發洋行寄賣」的〈時局圖〉轉載至《俄事警聞》時表示：「這一張圖，叫做〈瓜分中國圖〉。前年有一個人從英國新聞紙上譯出來的。」（《俄事警聞》第1期，1903年1月15日）雖然蔡元培謂：「翻譯這一張圖的人姓謝，是香港地方印的」，但此張「五彩鮮明」的〈瓜分中國圖〉應不同於謝纘泰的〈時局全圖〉，推測當時有關〈時局圖〉是流行題材，以圖像或明信片散佈於世界各地，此起彼落，究是何人何地為初始？且〈時局全圖〉究為謝纘泰所繪或翻譯外國報紙時事漫畫而成，實無法徵詳，只能留待日後文獻的陸續挖掘。但據謝纘泰友人馮自由1939年所撰寫《革命逸史·初集》回憶：「戊戌（1898）六月纘泰感慨時事，特繪製一『東亞時局形勢圖』，以警世人。圖中以熊代俄國，犬代英國，蛙代法國，鷹代美國，日代日本，腸代德國。其旁題詞曰：『沉沉酣睡我中華，那知愛國即愛家！國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馮自由，〈三十九年前之東亞時局形勢圖〉，《革命逸史·初集》，頁41-42。）若馮自由回憶錄可信，則〈時局全圖〉確為謝纘泰所畫，且這以謝纘泰為名而在香港繪製的〈時局全圖〉，的確流佈廣遠，影響也鉅。有關〈時局全圖〉的傳播與隱喻的跨文化流動，參見〔德〕魯道夫 G. 瓦格納（Rudolf G. Wagner）著，吳億偉譯，〈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1（2011.12）：14-39。有關瓜分概念與圖像隱喻，參見鄭文惠，〈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東亞觀念史集刊》4（2013.6）：270-280。

52 鄭文惠，〈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東亞觀念史集刊》4（2013.6）：263。

述或再生，都是一種自我復歸或重建自我以生產出新的主體化的心靈化過程。因而，有了《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人與空間可以重新賦意重新測繪重啟對話；在現實或價值層次上，《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的招魂術，藉著知識學理化及文學史視野，有著一套在地化的記憶編碼與喚回機制，則在為了抗拒遺忘而銘刻記憶的認知、識別和感知、興動的記憶與喚回過程裡，世代之間補綴記憶的同時，或許歷史就如同一道道活動布景被重新建構而創造出屬於當今的意義，人與空間的互涵相生與共榮互存也有了重新建構的可能性與可行性。

倘若香港文學作為一種銘刻記憶與抗拒遺忘的重要「構連場域」（site of articulation），⁵³則多元主體如何因著香港文學空間構連起日常經驗與主體性認同？藉由文學之靈如何建構自我意義及我群的認同？尤其多元主體又位處於不同的多樣的位置上。但也正因認同總是一種處在進行中而永遠不會完成的追尋或建構歷程，因而，往往需要透過不同的構連場域持續進行多元接合，當然認同過程總是不斷的互動溝通、折衝對抗。如果香港文學是記憶認同的重要構連場域，《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的編纂，實質上本然是一種文化實踐的再現，編纂本身就是一種認同的論述實踐（a discursive practice），它終將「自我」外顯化（externalize），⁵⁴而《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的編纂，洵是一個取得論述位置的開始，勢必連動的在認同建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影響。

文學空間本是一個多元異質的場域，文學空間中多元的「小敘事」或抒情聲音，往往提供了建構多元主體的可能，它可以翻轉一些由合法性所支持的「大敘事」及知識、行動，乃至於事物評斷準則，這也正是文學空間的文化政治。尤其文學空間中投射了象徵著一切良

善、理想的、諧美的應然圖像，因而有了《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作為多元主體的「自我」，終能凝視文學空間中「他異者」的「臉龐」所展示的一片純白，象徵著一切良善、理想的、諧美的應然的圖像，關乎生命的、社會的、世界的一種理想化的應然。這文學空間中「絕對他者」的「臉龐」，是自我的喚醒，是滌化我眼我耳我心我思，喚起一種道德良知與倫理承擔的對象物；透過文學空間凝視他者臉龐，潛入文學空間中迂緩的散步，反成了一種完善自我，神聖化自我內在光輝的重要的自我技術。因而，《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作為「構連」個人、社會以及文學文化之間的重要場域與召喚機制，或許開啟了體認他性差異倫理的契機，同時也開展了他異性的自我指認的可能、這是建構一個「互為主體性」的認同的重要起點。

因此，《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以一種跨時空的文學史視野與在地化的文化關懷融入於有史觀有史識的資料匯集與文本選萃中，當能引起公共性的長期關注與討論；《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作為一種具文學史意義及呈現文學史家美學觀的文體類型，不僅可與其他文學大系形成一種隱顯之間的對照系統，也是還原眾聲喧嘩的香港原生態文學的重要歷史現場，更是進入香港文學與文化現代化轉型與現代性歷程的歷史入口；更何況在語言文字的疆界空間中，情感與想像早已與世界、社會、事件、觀念、信仰重合交織成一個隱然的歷史動態而埋藏在語言文字的底層，《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的編纂及重寫香港文學史，或即是挖掘底層聲音的起始，一種指認自我，創造自我的敘事的開端，也是建構一座城市歷史輝光迂迴而曲折的必經或必然的入口。

53 有關認同是一種透過構連（articulation）進行的持續過程，參見 Stuart Hall, "Who Needs 'Identity'," Eds. Paul Du Gay, Jessica Evans and Peter Redman. *The Identity Reader*. (London: Sage, 2000), pp. 15-30.

54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Ed. Jonathan Rutherfor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p. 16-17.